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的確，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不僅可能反映出國際競爭的格局或國際政治的環境，也有可能反映出國內政治的結果(outcome)。但很可惜的，在主要的國際關係理論中，一般都把國家當作是討論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者(actor)，強調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因素，而把國家內部外交政策的運作過程及各種影響決策的動力(dynamic)加以忽略。此類的論述認為：不論國內政治的情勢如何變化，都不會影響該國的對外政策。然而一國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不全然是基於國家想要極大化它的權力，或符合其國家目標(national goal)；民意的壓力也會影響政府對外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衝擊後，許多原先的威權體制國家轉型而成民主體制，民意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增多，特別是選舉提供了一個民意能改變政府政策的機制。在如此的環境下，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否較以前更有可能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呢？因此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互動就成為一值得探究的問題了。

不過選舉真的會對一國的對外政策產生影響嗎？國際體系的影響力是不是真的較民意的流動更能解釋一國的外交走向？有沒有更多的例子能夠證明呢？本文將透過推論及比較的方式來說明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間的相互影響。

第二節 文獻分析

關於一國對外政策的研究途徑相當多，且和國際關係理論有相當密切的聯

繫。一般說來，此類研究途徑大致不脫國際體系決定論、國內政治決定論以及決策系統過程論的範疇。由於我們所要採用的討論途徑是以國內政治的因素來解釋國家的對外政策，也就排除了其餘可能決定對外政策的因素。因而我們在探討國內環境決定論之前，也必須把國際體系論以及決策系統過程論作一番檢視。

國際體系論者包含了國際關係學界中的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理想主義學派、結構現實主義(或曰新現實主義)學派與新自由主義學派。¹這些學派雖然彼此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於它們對外交政策的產出都著眼於國際體系(或說國家之外的結構)的影響，因而我們都把它們歸納於同一個層次。國際體系論中最早興起的就是理想主義學派。理想主義的觀點是以人性本善為出發，既然人心是良善的，那麼人性會傾向公眾的利益而非私人的利益。將這樣的前提推展到國家與國際社會中，國家自然會很克制自己的外交行為，遵守國際規範(norms)的約束。理想主義學派的學者也認為各國間的戰爭應設法阻止，而維持國際和平除了仰賴國際法與國際規範外，最好的方法則是建立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以維持各國間的和平。²

然而理想主義學派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格局完全遵循理想主義的安排(如國際聯盟與集體安全制度的成立)，但世人仍不免受到戰禍塗炭。傳統現實主義的興起就是這種時代背景的反應。如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的大家莫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一反理想主義的主張，以人性本惡為前提，而國家間自然是為了自身安全而互相爭奪權力。既然各國都是自利(self-interest)的，那麼國際安全便無法仰賴一個多邊的安全架構，唯有依靠各國自身的力量。³所以傳統現實主義學派會強調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才是維護國際和平的有效機制，至於達成權力平衡的途徑則有分而治之(divide and

¹ 國際關係理論中當然尚包括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但是建構主義的內容是對各家國際關係學派的批評而不是一種分析架構，因此未納入文獻分析的範疇。關於建構主義的觀點，可參閱 Alexander Wendt, 「國際政治的三種無政府文化」, 美歐季刊, 第 15 卷 2 期(90 年夏季), 頁 153—198。

² 包宗和, 「現實主義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 政大外交系國際關係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台北, 民國 92 年 7 月 5 日, 頁 2—3。

rule)、軍備競賽或補償措施等。不過自七十年代末起，傳統現實主義也遭受到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挑戰。

根據結構現實主義學派始祖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說法，國家的行為乃是源自於國際體系的影響，而非各國的領導人或國內的意識形態與政經制度。⁴此派的學者認為各國皆屬於國際體系的一員，而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anarchy)的狀態。由於無政府的狀態下，並沒有一個中央權威(central authority；比如世界政府)來維持各國的生存，因此各國唯有自助(self-help)才能在險峻的國際環境中存活。而就在這種無政府的結構下，各國基於自利的(self-interest)的動機，均以追求國家安全為主要目標，攫取權力為生存之道，因而各國的理性考量與國際體系的結構會制約一國的角色與定位，連帶影響其對外政策。⁵所以結構現實主義學派主張，一國對外政策的決策成因要從該國所屬的國際體系中尋找，它的對外政策不過是因應國際體系變動的函數(function)而已。例如在1970年代末起以戰略三角理論來分析美國、蘇聯與中國大陸間的外交競逐。⁶結構現實主義雖然仍舊在國際關係學界中獨領風騷，並且在九一一事件後再度主導了現今的國際格局，⁷但是仍不免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新自由主義承認現實主義世界是無政府狀態的前提，但不認為僅有國家才是國際社會中的行為者；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NGO)及其他非國家成員間的互動也是構成國際關係的要素。而且國家的目標更非只有國家安全，根據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說法，經濟、文化的力量(或曰軟性力量；soft power)較軍事力量(或曰硬性力量；hard power)更加重要。他們也認為國際典制(international regimes)能夠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促使各國理性的決策

³ 包宗和，「現實主義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頁3。

⁴ 石之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認識論的個人主義』對國際關係分析層次省思」，政大外交系國際關係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台北，民國92年7月5日，頁2。

⁵ 包宗和，「現實主義與批判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頁4—5。

⁶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July 1981, pp.485-516.

⁷ 吳玉山，「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政治科學論叢，第17期(91年12月)，頁1—32。

者合在追求最大利益的條件下推動國際合作，因此新自由主義對於國際合作的前景自然是十分樂觀的。⁸國際體系決定論中除了上述四派外，還包括地緣政治的觀點。主張地緣政治論的學者認為，欲分析一國的外交政策，則必從該國所處的地理環境入手。例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中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說明美國在廿一世紀的當務之急在於防止一個能威脅到美國霸權的政權在歐亞大陸出現。⁹從理想主義學派、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結構現實主義學派、新自由主義學派到地緣政治理論，各個重要學派的共同特性是它們都從國際的環境中找尋國家外交政策制定的原因，並沒有深入決策者的決策過程與國內的政治環境。

解釋外交政策的第二個範疇是決策系統論。決策系統論者認為一國對外政策形成的主因是在於決策者與決策過程。此派論者強調的是決策機關的組織結構和參與決策者對此議題的認知，以尋求對該國外交政策的緣由。例如危機理論強調組織、決策系統、各組織的負責人或決策過程的重要性。系統論中還有一個分支是強調決策者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一位強勢的國家領袖才是決定一國外交政策的最後關鍵，像毛澤東幾乎決定了所有中國大陸的外交決策。¹⁰

最後一個研究途徑是從國內政治的面向著手。國內環境決定論者認為，要了解一國的外交政策，則必須從了解一國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政治或經濟因素來著手。例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會認為若是要了解中共的外交政策，則必須從過去中國的歷史、或中國對外在世界的看法中來尋找答案；¹¹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者，會從共黨的意識形態來分析前蘇聯及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¹²也會從回教激進教義的興起來解釋 911 事件的發生。強調國內政治或經濟因素者，會多半認為某一種的政治或經濟制度會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從一國經濟制度解釋

⁸ 吳玉山，「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布希主義」，頁 4—5。

⁹ Zbigniew Brzezinski 原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民國 87 年)

¹⁰ 例如葉伯棠，「論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載於張雪豔主編，葉伯棠先生中國大陸研究紀念文集(台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 80 年)，頁 119—149。

¹¹ 例如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民國 83 年)

¹² 例如 Benjamin I. Schwartz,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對外政策的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列寧認為西方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後，列強為了攫取工業產品的原料及開拓產品的市場，必須向外擴張，因而出現了帝國主義。¹³ 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論則是承襲了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的觀點。根據他們的說法，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會引導對外政策的方向，而民主國家因為尊重人權與施行民主制度，所以能夠促進國際秩序的穩定。另外根據歷史的經濟，民主國家之間因享有共同的價值觀，因而會傾向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爭端，¹⁴簡言之，就是「民主國家不相戰」。

有別於以上的討論，普特南(Robert Putnam)以雙層賽局理論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各國在民意(例如國會與利益團體)的壓力下，對外條約或協議是如何達成的。¹⁵ 因為國內能接受國際協議的最主要原因仍在於是否他們能藉由此協議得到比現狀更多的利益，且在一般的民主國家中，任何對外條約都必須經過國會批准方能實施，所以這兩個層次是互動的。普特南運用分析的主要概念是“win-set”(中文譯為「共識圈」或「勝集」，此語意指能被國內多數接受的“set”(集合))，普特南認為國際協議成功的關鍵在於 win-set 的大小，只要國內的 win-set 愈大，則愈有助於該國達成國際協議，反之如果 win-set 愈小，則可帶給談判代表愈強硬的態度。而 win-set 的大小則是與偏好的排序、談判代表的策略和本國的政治制度有關。例如威權政府因較不受民意羈絆，就愈有可能享有較大的 win-set，也愈有可能和外國達成協議。

普特南的雙層賽局理論被國內學者林繼文予以更細膩的詮釋。¹⁶ 林繼文用三

Press, 1968)

¹³ 列寧，論帝國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1—10。

¹⁴ 李海東，「北約擴展研究綜論：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與『制度—民主』的分析視角」，美歐季刊，第15卷，第1期(90年冬季)，頁69-115。關於民主和平論的概念，請參閱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1151~1169.

¹⁵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summer 1998), pp.427~460.

¹⁶ Jih-wen Lin, “Two-Level Games Between Rival Regim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emaking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6(November/December), pp1~26.

個分析架構來深化 win-set 的意涵。它們是：偏好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preferences) 現狀的位置(the location of the status quo)和國內的政治機制(domestic institutions)，他並用代數導出模型，並說明該模型的政治意涵如下：(1) 一國的民意愈不能接受現狀，則民意對執政者要求改變現狀的壓力會愈強。(2) 如果執政者的目標是想要極大化他的民意支持，則調整現在政策從現狀往本國民意的中央(峰點)是最佳策略；此策略同時也可減輕國際的報復。(3) 如果新政策創造出愈多的 win-set，則該政策愈不穩定。

同樣從國內政治面向切入的還有選票極大化模式，選票極大化模式的出發點是議題空間。¹⁷在選民行為的研究途徑中，理性抉擇的空間模型可測量選民的政黨立場，選票極大化模式就是延續如此的思路展開。謝復生就以「統一/獨立」與「經濟/安全」作為平面上的 x 軸與 y 軸，交織出台灣在大陸政策上的二維空間，將台灣對於大陸政策有影響力的各股政治勢力擺在此議題空間上，¹⁸以此推論出台灣的大陸政策立場。¹⁹吳玉山則作了更進一步地嘗試，他亦以「統一/獨立」與「經濟/安全」作為展開平面的兩軸，不過他選取的行為者是台灣的各主要政黨及黨內的主要流派，另將近年來的民調結果與空間模型冶於一爐，嘗試以動態的觀點來解讀各黨大陸政策的立場。他發現自九 0 年代以來，各黨在大陸政策的立場上已漸漸地朝原點方向，也就是認同與利益兩條常態分配曲線的峰點趨近。²⁰從謝與吳兩位學者的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間的聯結機制。

但是上述的各家理論畢竟有它的拘限。文化與歷史的內容包羅萬象，我們很難去確定那一段的歷史會對現今的對外政策產生影響，而兩者之間又是如何彼此

¹⁷ 議題空間指的是以議題為軸所展開的座標圖，可在上面標誌各種不同政策的選擇點。

¹⁸ 謝復生文中舉出的行為者是國民黨主流與非主流派、民進黨的美麗島與新潮流系、企業界、情治機關、急統派、陸委會、經濟部與中國大陸。

¹⁹ John Fu-sheng Hsieh, "Chiefs, Staffers, Indians, and Others: How Was Taiwan's Mainland China Policy Made?"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5), pp.137-169.

²⁰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於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民國 88 年），頁 173—203。

影響的。意識形態解釋的途徑運用在中東國家和前共黨國家很有解釋力，然而若是運用到一般民主國家，可能也會遇到和歷史文化途徑一樣的難題。決策過程的難處則是政府重大的決策過程常被列為機密，需要等到檔案解密後才能獲得進一步地印證。況且在民主國家，決策的過程十分複雜，往往不是一人可以決斷。民主和平論的焦點多集中於一個國家是傾向和平或是好戰。雙層賽局研究途徑雖以博弈理論的思惟明確地描摹出一國的國內政治是如何影響對外政策的，但是 win-set 不容易定義，而且也不容易確定政府與民意的 win-set 是否交集。這些因素都大大地限縮了此途徑的解釋能力。

在檢視了以上幾個理論中，我們發現如果要應用國內政治的研究途徑，不得不注意民意的重要性，加上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可以預見的是，會有愈來愈多國家的對外政策無可避免地受到民意的衝擊。而最能檢視一國民意走向的就是選舉，這就把我們討論的焦點集中到對外政策與選舉的關聯上。選票極大化模式一方面捕捉到了選舉的面向，又能解釋選舉與對外政策的關聯，所以本文將運用選票極大化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並找尋可以比較的事例，以求能描摹出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相互影響。

第三節 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因為選票極大化模式的指涉是兩岸關係，那麼我們在選取比較的事例時，就必須照顧到兩個主要的面向：總統選舉與兩岸關係的特殊性。選取總統選舉的原因是，從「杜佛傑法則」(Duverger's Law)中，我們了解到選舉制度的差異是會產生政治影響的。²¹而本文選取的事例分別是：烏克蘭 1999 年 10 月的總統大選、中華民國 2000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及南韓 2002 年 12 月的總統大選。其

²¹ 意指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易產生兩黨制，比例代表制則易產生多黨制。

中，烏克蘭的總統選舉是採用二輪決選制，南韓的總統選舉與台灣的總統選舉則都是採用相對多數決制。²²雖然選舉制度有些微的差別，但是選舉的性質相同，都是將全國當作單一選區的行政首長選舉。接著想問的是，南韓與烏克蘭有沒有一個和兩岸關係相似的對外關係呢？

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在於，首先，兩岸曾有過統一經驗，且雙方具有歷史與文化的淵源。其次，兩岸有著衝突性的主權要求與權力的不對等：兩岸間存在著主權爭議，甚至於為此爆發過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例如 1958 年的金門危機)，而且中國大陸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實力遠超過台灣。

南韓的總統是直選產生，兩岸關係的特性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南北韓的關係。²³兩韓關係和兩岸關係的類比，是學術界最早出現關於兩岸關係的理論化著作，我們將它統稱為分裂國家理論。²⁴分裂國家理論假設分裂的雙方都想要恢復國家的統一、認同彼此共有的文化，而且隱含了分裂雙方在國際上地位平等與高懸雙方和平統一的理想。雖然上述種種價值取向與前提在民主化後的台灣都面臨到適用性的爭議，但如果我們能不受價值規範與指涉的羈絆，僅捕捉兩方互動與國內政治關聯的面向，那麼兩韓關係與兩岸關係作為類比的解釋力還是很強的。²⁵烏克蘭的總統也是直選產生，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在烏克蘭就是指它與俄羅斯的關係。古俄羅斯文化濫觴於基輔，在帝俄與蘇聯時期烏克蘭是俄羅斯的一部份。現今烏克蘭雖然已經獨立，但是莫斯科對於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仍提出了準主權的要求(quasi sovereignty claim)。另外烏克蘭(甚至於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在領土大小與國際地位皆相差懸殊，台灣與中國大陸亦然，因而俄烏關係與兩

²² 可視為以全國作為單一選區的相對多數決制。

²³ 雖然南韓的國力遠勝北韓，但是北韓的核武實力仍是南韓(甚至於東北亞)所憂心的

²⁴ Gregory Henderson, Richard N. Lebow and John G. Stoessinger, eds, *Divided Nations in a Divided World* (N.Y.: David McKay, 1974) .

²⁵ 關於分裂國家理論於兩岸的適用性，請參見張五岳，「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載於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105—114；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頁 166—173；Tun-jen Cheng, “The Mainland China-Dyad as a Research Program”,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and Samuel S.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p.6-7.

岸關係是具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²⁶

在確定了兩岸關係、兩韓關係與烏俄關係是可以對比的之後，我們還要能確定這三種關係是會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在烏克蘭，1994 年總統選舉後新上任的庫奇馬(Leonid Kuchma)，在外交上對俄羅斯改採扈從的態度。在南韓，1997 年總統選舉後，新上任的金大中改對北韓採取懷柔交往的態度，都和前任政府有別。在台灣，1996 年的總統選舉後李登輝雖然仍舊持續對大陸的抗衡態度，但這是他在北京軍事威脅下的選舉訴求。因此我們確定這三種關係是會受到國內政治 (在本文就是選舉)所影響。

若我們更深一層地探究這三國國內政治的情形，會發現這三國的民主機制有很多的相似性。第一，這三國這些國家同屬受「第三波」民主化照拂的新興民主國家，且民主化的時間相近。台灣的民主化發軔於 1987 年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南韓的民主化也是始自 1987 年盧泰愚發表的「民主化宣言」，烏克蘭的民主化則是始自 1991 年的總統直選，1991 年底蘇聯瓦解後正式獨立。第二，三國在民主化後的政府體制都有了一個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架構。²⁷半總統制的概念根據杜佛傑(Maurice Duverger)的定義，包括總統直選、總統有實權與總理須對國會負責三項。前面提過，中華民國、烏克蘭與南韓的總統都是直選產生，滿足了半總統制的第一個要求。在總統的權力上，我們可以從三國制憲(或修憲)的背景中看出這三國的總統都具有實權。中華民國總統經過 1991 年起的六度修憲，總統已可直接任命總理(行政院長)而毋需國會(立法院)同意，加上台灣政治轉型與中國大陸軍事威脅下的背景，而這些背景都是有助於總統擴權的。²⁸南韓總統在民主化前就擁有很大的權力，1987 年的第六共和憲法中也僅僅限制總統的緊急命令權，然而這是為了防止再有軍人政變的考量，南韓總統仍是實權

²⁶ 吳玉山，抗衡或扈從 - 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民國 86 年)。

²⁷ 請參見；吳玉山，俄羅斯轉型：1992—1999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民國 89 年)，第三章。

²⁸ 吳玉山，俄羅斯轉型：1992—1999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頁 131。

總統。烏克蘭的總統在 1991 年獨立後、新憲法尚未出爐前被國會(人代會)賦予了不少緊急命令權，而這些權力都在 1996 年的制憲中落實為正式的憲法條文，因此烏克蘭總統也是實權總統。²⁹

半總統制的最後一個要求是總理需對國會負責。中華民國憲法是明文規定行政院長須對立法院負責的(第 57 條)。烏克蘭的總理任命須經國會通過，而國會也可經由不信任投票來倒閣，這就表示烏克蘭的總理是對國會負責的。南韓憲法中雖沒有明文規定總理須對國會負責，而是輔佐總統、統轄各部，但總理的任命仍然是須要國會同意(第 86 條)，這也意味著政府(內閣)是對國會負責的。另外南韓憲法並未賦予國會倒閣的權力，而政府也不能解散國會；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行政和立法兩會的分立，南韓國會有權「建議」總統免除總理或各部部长(第 63 條)。雖然此一條文對總統並沒有拘束力，但部長的「不信任案」一旦在國會中通過，總統仍會面對各界排山倒海的壓力而不得不將其免職。此慣例可從 2001 年 9 月初南韓國會提出對統一部長林東源的「不信任案」一事中看出。林是金大中的得力助手，又是「陽光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林若去職必定會對金大中政府產生很大的衝擊。但俟不信任案一通過，不僅林個人請辭，總理李漢東亦率內閣總辭，好讓金大中能放手重組政府。顯見南韓總理是必須向國會負責的，總統亦無法漠視國會的決議，因此南韓的總理也是需要對國會負責的。所以我們說台灣、南韓與烏克蘭都具有半總統制的架構。

第三，這三國的投票行為都顯現出前現代性的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一般通常將社會分歧分為三種類型：前現代性(pre-modern)、現代性(modern)與後現代性(post-modern)。前現代性的社會分歧通常指的是因地域、族群或宗教而生的原生性(primordial)分歧，而現代性的社會分歧指的則是因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帶來的勞資對立，後現代性則是圍繞在環保與經濟發展之爭，或是兩性平權等議題(如美國對墮胎的爭議)上。在我們所選取的這三個總統選舉中，一個顯著的現

²⁹ Andrew Wilson, "Ukraine: Two Presidents and Their Powers," in Ray Taras ed, *Post communist Presid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84.

象是：民主化的選舉並不能消弭原有的族群、³⁰次族群、³¹地域或宗教分歧，³²反而使相對應的政治勢力將其運用為構成政黨的基礎，進而成為動員選票的工具。³³易言之，俄烏關係、兩韓關係或兩岸關係都和地域分歧相互對應。它們不僅都反應了該國前現代性的分歧，亦是基輔、漢城與台北一條最敏感的神經。

現在我們能夠確定，烏克蘭、南韓與中華民國的內外環境皆有相似之處，是可以選票極大化模式加以比較的，那麼我們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比較這三國的總統選舉了。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章節安排

在確定了本文的分析架構後，就要進入各國的事例了。第一章是方法論，第二章是台灣 2000 年的總統選舉，而討論焦點放在勝選的陳水扁，這一章也是全文討論的基礎。第三章將聚焦到南韓 2002 年的總統選舉，焦點同樣放在勝選的盧武鉉。第四章則是烏克蘭 1999 年的總統選舉，主要的事例是勝選且連任成功的庫奇馬。第五章則是結論，探討這三位候選人致勝的秘訣何在。但是在展開討論前必須要說明的是，本文已將「國內政治」的範圍縮小至選舉，探討的焦點在於兩岸關係、兩韓關係與俄烏關係(也就是大環境的結構)如何影響中華民國、南韓與烏克蘭三方總統候選人的選舉策略。因而如行政與立法部門間的衝突，三位總統候選人的性格或施政作風，及選舉期間中國大陸、北韓與俄羅斯對彼三國總統選舉的反應或相對措施，均未納入本文的討論範圍。

³⁰ 如捷克與斯洛伐克於 1992 年的公投結果，決定雙方自 1993 年起各自獨立。

³¹ 如台灣的省籍、統獨與國家認同。

³² 如前南斯拉夫中的塞爾維亞(Serbia)、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斯洛凡尼亞(Slovenia)等國。

³³ 吳玉山，「制度、非正式制度與結構對政治穩定的影響」，中國政治學會九十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北，民國 90 年 1 月 6 日。